

人类学时间研究的新动向：《未来人类学》述评

木 燊 成

未来,一般被认为是构成人类基本时间观念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意识之一。^①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来意识不时被强调为一个亟需重视的人类学论题,但系统化程度较高的成果却较为鲜见。2019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人类学新动向书系”出版了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瑞贝卡·布莱恩特(Rebecca Bryant)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丹尼尔·奈特(Daniel M. Knight)合著的《未来人类学》。^②该书发出了“未来作为方法”(the future as method)的研究倡议,是相关领域迄今最具系统性的一项成果。同样致力于未来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柯林斯(Samuel Collins)曾评论称:“此书为人类学未来研究这一快速发展的议题做出了鼓舞人心的贡献。尤其是,它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未来,人类学家如何发挥自己的角色?”^③本文尝试述评其要旨,宣介人类学时间研究“未来作为方法”的新动向。

一、发轫:从“现在中的过去”到“现在中的未来”

人类学曾长期偏重过去—现在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类学时间研究的经典之作中,非西方社会的未来意识若非被忽视,^④就是被视为过去—现在意识的附庸,而试图预测或掌控未来的趋向,则往往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专属。^⑤随着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人类学对西方社会研究的介入,现代化的状况和与之伴随的未来权重提升^⑥逐渐进入人类学的视野。而为了阐释现代化下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动,人类学在理论与方法层面也开始突破各种决定论的框架,试图探寻实践活动中富有创造性的一面,^⑦这使得未来意识作为体现

① Alfred Gell, *The Anthropology of Time: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emporal Maps and Images*, Oxford: Berg, 1992, p. 237.

②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Samuel Gerald Collins,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by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review),”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93, No. 2, Spring 2020.

④ 于贝尔(Henry Hubert)、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布洛赫(Maurice Bloch)都曾贡献过时间研究的经典之作,但这些作品均未针对未来观展开系统分析。相关研究回溯参见木燊成:《实践中的时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7—37页。

⑤ 参见布迪厄对卡比尔人与法国人未来观的比较: Pierre Bourdieu, “Time Perspectives of the Kabyle,” John Hassard eds., *The Sociology of Ti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p. 219—237.

⑥ 贝克(Ulrich Beck)曾指出,现代化带来社会风险激增与不确定性加剧,使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它作为今天经验与行为的归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取代了”。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郗卫东编译:《风险社会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⑦ 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6, No. 1, 1984.

人类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得到了重视。

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的时间研究日益专门化,“未来”也开始迈入人类学辩论的前台。1992年,杰尔(Alfred Gell)在《时间人类学》一书中认为,人类享有共同的基本时间认知机制,它由回忆、感知、期待三种机能触发的统一于当下的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构成,未来在其中持续发挥着指引现在的效力,是时间意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①同年,芒恩(Nancy Munn)在她对人类学时间研究的系统批判回顾中指出,无论是计时方式的探究、时间观念的概括,还是对记忆与历史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相较于给予‘现在中的过去’的细致考量,人类学家们一直在‘碎片和补丁’式地讨论未来……未来在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家园里被动地缺席了”。^②据此,她倡议人类学重视对未来意识的探讨。沃曼(Sandra Wallman)则于同年发表了论文集《当代的多样未来》,其中收入了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ASA)于1990年在爱丁堡召开的年会“人类学的未来研究”(An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中的12篇文章,讨论了工业社会与非工业社会中人们的某些未来愿景,以及由一些当代社会的新趋势引发的对人类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并汇集出了四点关于未来之社会效力的结论。^③这些作品给后续人类学对未来的探究奠定了基础。

二、进展:《未来人类学》

《未来人类学》恰是基于以上脉络而展开的进一步研究。基于对时间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地中海东部沿岸塞浦路斯、希腊当地社会动荡状况的长期实地调研,布莱恩特和奈特对人们的未来意识和当代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重视,并试图以这本合著推动人类学未来研究的继续进展。

两位作者在书中首先回顾了人类学研讨未来的历程,尤其对21世纪以来的相关成果给予了详尽述评。这些研究主要出现在一些相关议题之中,如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城市与国家发展计划、微观经济与金融、时间管理与预测、生物技术、人类世(anthropocene)、气候变化与能源危机、地球极限与太空探索、时计与时间性的多样性、时间绵延理论、历史意识等。其中不乏如柯林斯《明日诸文化》^④与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未来作为文化事实》^⑤一样明确提出要振兴人类学未来研究的作品。但布莱恩特与奈特认为,即便这些成果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未来研究的重视,但“其中大部分都没给出可资跨文化地研究各种未来时间性的工具”。^⑥

有鉴于此,两位作者提供了“导向”(orientations)这一概念,作为人类学展开未来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工具。他们认为,交织着人、物、事的实践活动与时空持续互构。实践活

^① Alfred Gell, *The Anthropology of Time: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emporal Maps and Images*, Oxford: Berg, 1992, pp. 233—234. 木聚成、贾仲益《时间的构成与认知:杰尔的时间人类学理论内核述论》(《民族学刊》2020年第1期)曾对杰尔的时间认知理论予以剖析,可资参考。

^② Nancy Munn,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Time: A Critical Essa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1, 1992.

^③ 这四点结论包括:未来可被用于合理化现在的行为;未来场景可发挥阐明现在或委婉批评现在的作用;对未来的信念支撑着自我意识及其存续;未来信念的改变能够剧烈地改变个体、群体、自然、文化之间的关系。参见 Sandra Wallman eds., *Contemporary Futures: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15—16.

^④ Samuel Gerald Collins eds., *All Tomorrow's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 Future*, Oxford: Berghahn, 2008.

^⑤ Arjun Appadurai eds., *The Future as Cultural Fact: Essays on the Global Condition*, London: Verso, 2013.

^⑥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6.

动是多样的,从而时空也是多样的,每种时空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一情感结构”(teleoaffective structure)。它内含着一系列目标、筹划、事功,以及附着其上的情感与情绪,这些因素会丛集为一种导向,牵引着个体和群体的所思所为。随着多样实践活动的展开,不同的导向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变换、交叠、冲突。^①通过推出“导向”这一概念,两位作者既意在强调目的论,突出未来导引行动的效力,但也试图规避进化论和进步论的先入之见,力求把未来的开放性或不确定性包纳进来,给位于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阈限提供厚重感或孔隙感,使未来的丰富性、微妙性都能得以凸显,以便人类学研究者更系统有效地以民族志来观察与讨论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未来与行动的关系。^②

他们试探性地辨析出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导向:预备(anticipation)、期盼(expectation)、推测(speculation)、潜能(potentiality)、希望(hope)、宿命(destiny),并在书中依次各列一章展开了深入阐发。沿着一种试图勾连时间哲学、时间社会理论以及时间民族志的努力,每一章都包括了与某一导向相关的哲学讨论、人类学或其他人文社科成果梳理、民族志和历史等材料剖析,以指向对此导向之特点的概括。

第一种导向是预备。两位作者认为,这一导向能将现在缩减,把未来急迫地拉入现在,促使人们调动过去的经验,为迈进未来做好准备。^③集体层面的预备往往与剧烈危机的迫近相关。危机的迫近会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形成富有威胁的未来。而在预备之中,人们会以一种以先发控制的方式,试图把握或改变那些即将到来的事件,以消解对不确定性的焦虑。^④文中举例,在1963年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冲突爆发前几个月,一些土耳其族居民就已察觉到当时的紧张气氛极有可能演变为大规模暴力冲突,于是成年男性开始彻夜不眠地在家门前守卫,妇女则带着孩子离开村庄,试图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旨在预防暴力伤害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人们在预备的导向下采取的行动。^⑤

第二种导向是期盼。期盼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导向,它把现在对过去的延续投向未来,形成一种对未来的展望。两位作者强调,不同于预备那种力图迈入未来的强烈实操性,期盼是观望式的,它唤起对未来应会如何的设想,但不给人以未来业已迫近的感觉。^⑥在集体层面,期盼常关联于和平繁荣的生活,或人们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文中举例道,在1974年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再一次的武装冲突尚未爆发之前,一些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曾以为未来的生活也将如过去一样平和地展开,然而战争的爆发粉碎了这种期盼,在此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当下的生活是异常的,而曾经享有的(或其他正处于和平与繁荣之中的人们所拥有的)那种能够从容地期盼未来的状态,才是正常的生活。^⑦据此,两位作者强调,虽然期盼中的未来就像视野中地平线(horizon)上那些模糊的景象,可能实现也可能变化或幻灭,但它却恰是维系“正常的生活”,给人以安定感的一种重要因素。^⑧

①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16-20, 195.

②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93.

③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28.

④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48.

⑤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22.

⑥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59.

⑦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50-52.

⑧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77.

两位作者分析的第三种导向是推测，它被认为经常出现在期盼与预备之间的空隙、间隔或延搁当中。人们在期盼业已破灭，但又无力预备未来的状况下，常会觉得被困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之中，这时，推测极易繁盛起来，它带来一系列推理、臆断、幻想，使过去、现在、未来都会被彻底重估，以填补期盼和预备的难抵之处。^①两位作者认为，在集体层面，推测往往兴盛于危机或社会转折之时，它使社会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猜忌、流言蜚语、阴谋论，也会让那些善于操纵信任的投机者得以盛行。^②英国脱欧被两位作者认为是可资呈现推测的典例之一：欧洲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曾是英国留欧派过去生活的主流，也是他们期盼中的未来，但脱欧却悬置乃至终结了这种生活，动摇了留欧派对上述理念的笃信；加上脱欧公投后英国与欧盟谈判进程的缓慢，拖延了英欧双边未来政策的明朗化，使留欧派们因一时无法期盼和预备未来而陷入了对前脱欧时代生活理念的怀疑和对后脱欧时代生活状况的推测之中。^③

相比于预备、期盼、推测，潜能则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导向，它被认为是尚未实现或者还未被确切认识到的能力和趋势。^④在两位作者看来，潜能不是现实却与现实并存，或许初露端倪也可能长期蛰伏，可能会被实现也可能永不实现，但它却遍布于日常生活，是使现在孕育着未来，使未来内在和超越于现在的一个重要因素。^⑤在生命历程方面，潜能可以导引着人们超越已被预定的未来。书中以作者之一奈特的一份自我民族志对此进行了呈现。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于英格兰南部地区的一个底层劳工家庭，从小成绩优异，且怀有成为一名学者的理想，却被家庭、学校劝导不该去追求超出自己所属阶层的生涯。通过努力争取以及一系列机缘，他发挥了自身的潜能，走上了一条教研之路，挑战并超越了他的出生背景所预定的未来。^⑥在公共生活层面，潜能会催发出一些新的社会动向。比如，一些新科技，如基因工程拥有的干预人类生殖方式的潜能，就激起了公众介入医疗程序的道德责任感和对人权的进一步重视。^⑦但两位作者也指出，潜能往往不能都被实现，当它被阻断或延搁，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放弃或漠然，另一种是希望。

希望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性的导向，它出现在潜能与现实的裂隙之间，在潜能被阻断或被消磨至仅有残余之时，希望会以一种较为强烈的势头迸发出来，试图将尚未实现的潜能转化为现实，导向一系列已蕴含于潜能之中的未来。^⑧两位作者指出，在那些有望左右社会的未来走势，但又颇为短暂的社会活动之中，往往能看到希望在集体层面的剧烈迸发。政治竞选即被认为是典例之一。^⑨文中以2008年美国大选与2015年希腊大选为例进行了呈现。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经济和医保改革、能源独立、伊拉克撤军等施政计划，被不少选民认为能够有希望解决其前任布什(George Bush)在任期间未能面对的各种问题，最终支持他赢得了总统大选；在2015年希腊大选中，左翼政党领袖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提出争取废除财政紧缩、提高工资水平等政策，被选民们认为有希望一改过去5年来希腊因债务

①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79.

②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03.

③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89—90.

④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07.

⑤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31.

⑥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105—107.

⑦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125—126.

⑧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34.

⑨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56.

危机而民生凋敝的状况,从而支持他赢得了总理之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场选举中,参加竞选集会的民众都将“希望”用作了支持两位候选人竞选的主要标语。两位作者认为,在政治竞选期间,政治修辞、富于希望内涵的图像、朗朗上口的标语、媒体的鼓吹等手段,作为一种“想象的技术”,能够让公众短暂地瞥见各种微型的乌托邦,看到能将潜势变为现实的可能,从而迸发出希望,积极参与到投票或助选之中。但是,随着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获选后对允诺的政策的不折扣、延搁乃至无法落实,公众曾经的希望也会逐渐破灭。^①

书中讨论的最后一种导向是宿命。宿命被认为是一种富含超越性和终极感的导向,它打开了远超前几种导向的未来视野,将人们引向各种据信是已然注定的终极未来。^②两位作者强调,宿命中的未来虽远在期盼的视野之外,却又内在于现在之中,给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嵌入了一种能够兼容决定论(determinism)和权变性(contingency)的未到其时属性(untimeliness),让人们把生活中的一些意外、挫折与苦难理解为迈向宿命终点的必经之路。^③书中举例,各个群体都有其共享的宿命,如传统社会的永恒回归论、亚伯拉罕系宗教的末世论、资本主义全胜论或消亡论等。美国例外论也是典型例证之一。美国例外论宣称,美国乃是特受上帝庇佑的“山巅之城”,它不仅是所谓自由国家的不朽典范,还负有将所谓自由秩序带向世界的永恒使命,这种以历史叙述为形式,但又超越于历史本身的宿命论,不仅导引着美国的国家建设、外交政策,也凝聚着美国民众的国族自信。^④两位作者对宿命的探讨,尤其对宿命中的终点所具有的导向之效的关注,与书中论及的其他导向一道,凸显出原因受惠于结果的可能和未来驱动现在的效力,引申出对因果决定论、线性时间观与历史决定论等观念的反思。^⑤

三、小结:倡导“未来作为方法”

通过对上述导向的剖析,布莱恩特和奈特为讨论未来这一时间意识的社会效力提供了一套颇为系统的分析方法,有力地改变了前述芒恩所谓的“人类学家们一直在‘碎片和补丁’式地讨论未来”的局面。借助导向提供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未来如何以丰富的形式导引着实践活动,塑造着人们对当下的不同体验,并且同构于日常生活的多维性和开放性。人们对未来的体验可能非常细微,如预备,在稍纵即逝的瞬间立即体悟到具体的临近之事;也可能极其宏大,如宿命,把跨越广阔时空的诸多关联抽象地整合为结构化的设想。这些随着不同实践活动的展开而切换的未来意识,既为人们打开了不同形式的时空,开启了一系列或近或远的目标,也牵动着人们的情绪起伏,蕴藏了改动人生轨迹与社会走向的效力。但正如两位作者所提示的,六种导向的辨析是试探性的,其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仍值得继续探索。后续研究既可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导向与具体问题相配开展研究,如预备与危机、希望与政治的关系;也可继续探索不同导向之间的关系,如在何种情况下,期盼变为了预备,推测又转化为希望;还可以争取发掘出更多的未来导向,如书中多次提到的“漠然”(apathy)。^⑥

①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132-134, 143-149.

②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60.

③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161-162.

④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184-187.

⑤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190-191.

⑥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9, 95, 127, 131.

此外,通过在政治变局、经济危机、技术革命、人生曲折等现象中讨论各种未来导向,两位作者体现出“未来正以不确定、脆弱、以及通常是相当可怖的方式出现,已是我们所研究的那些人群的一种生活基本状况”。^①可以说,运用“未来作为方法”的视角,对于人类学更为周全地呈现当代社会重视未来的典型特点具有推动意义。不过,正如柯林斯所批评的那样,虽然布莱恩特和奈特比较精妙地呈现了民众对未来的渴望或忧惧,却并未对左右着这些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力量展开系统批判,这限制了未来研究的格局,让人类学家沦为了被研究者之未来的旁观者。^②其实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尖锐地指出,持续动荡与高度不安乃是资本社会及其人群心态的典型特点,^③并将这种现象紧密结合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未来社会方案的倡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有效地吸纳相应观点与方法,把对人们的未来意识的呈现、批判、介入妥善地结合起来,也将是人类学的未来研究所需继续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将未来更具核心性地整合到过去—现在—未来关系中,布莱恩特和奈特倡导人类学要改变对过去—现在关系的过分强调,提升对日常生活中的目的论及其不确定性的重视,朝着“从存在到生成、从结构到能动、从各种社会体制到将之投射向未来的希望、计划、实践、行动”^④的考察方向迈进。布莱恩特与奈特还对费边(Johannes Fabian)有关“时间意识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方法而言是至为关键的基础”的判断^⑤进行了延伸性思考,指出恰是由于对过去—现在关系的偏重,阻碍了人类学对能动性的妥善考量和对富有未来开放性的现代生活加以周密研究。^⑥从这个意义上说,倡导“未来作为方法”,可谓是从夯实学科时间意识的角度出发,对进一步拓展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重视历史是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特色之一。中国的史学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偏重过去—现在关系的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都可被视为协助生成这一特色的重要因素。但此特色是否也招致了学科未来意识的薄弱和对未来研究的忽视?近年来,已有中国人类学学者注意到相应问题,并试图就扭转局面做出尝试。^⑦协同相关成果和《未来人类学》提供的启示,必将有益于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进展。

(作者木槲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93.

② Samuel Gerald Collins,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by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review),”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93, No. 2, Spring 2020.

③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④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 193.

⑤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6—152.

⑥ Rebecca Bryant and Daniel M. Knigh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uture*, pp. 3—4, 192.

⑦ 对过去—现在—未来意识予以协同讨论的民族志分析,如黄应贵:《时间、历史与实践:东埔布农人的例子》,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湾“中研院”民族学所1999年版,第423—484页;强调树立未来意识于开展日常生活研究之必要性的讨论,如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